

“齐物论”思想与人物的精神分析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群山之巅》

□王春林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一大艺术特色，就是成功采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所谓“去中心化”，就意味着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艺术聚焦方式来面对故事发生地龙盏镇的那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艺术聚焦方式的采用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作家的多少带有一点“齐物论”色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谓“齐物”，就意味着不仅地位身份不同的人们在迟子建眼里是等量齐观的，而且人与其他各类事物之间也都处于某种可谓众生平等的状态之中。举凡动物、植物，甚至包括自然风景在内，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皆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异。众所周知，迟子建小说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擅长于自然风景的点染描写。这一点，在《群山之巅》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比如最后第十七章中的一段文字：“但霜也有热烈浪漫的一面，它浸入树叶的肌肤，用它的吻，让形形色色的叶片，在秋天如花朵般盛开。松树的针叶被染得金黄，秋风起时，松树落下的就是金心了。心形的杨树叶被染成烛红色，秋风起时，它落下的就是一颗颗红心了。最迷人的要数宽大的柞树叶了，霜吻它吻得深浅不一，它们的颜色也就无限丰富，红绿交映，粉黄交错，秋风起时，柞树落下的，就是一幅幅小画面了。这时你站在龙山之巅，放眼群山，看层林尽染，会以为山中所有的树，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花树。”

我曾经一度以为，迟子建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极富感染力的精彩风景文字，乃是因为作家内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自然之爱。现在看起来，这种理解未免显得有些肤浅。自然风景点染描写的背后，固然有着迟子建的自然而爱，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作家自己也未必能够清醒意识到的“齐物论”思想。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迟子建“齐物论”的思想立场，一方面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物的主体性的最终确立。因为“去中心化”叙事策略的采用，《群山之巅》自然也就成了一部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悉数登场的那些龙盏镇人物，可以说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说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物，都因此而获得了充分的主体性。伴随着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取，《群山之巅》也就成为了一部具有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把《群山之巅》判断为一部“北中国乡村世界的生命浮世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所谓浮世绘，按照《辞海》中的解释，乃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浮世是现世的意思，故其描绘题材大都是民间风俗、优伶、武士、游女、风景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浮世绘一般以色彩明艳、线条简练为特色，因多数反映当时的民间生活，曾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发展，至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这里，我们意在借用这一绘画术语指明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基本思想艺术风格。关于小说写作，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看法：“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非常明显，米兰·昆德拉此处主要是针对现代小说发表自己看法的。在他看来，一部优秀的现代小说就应该是“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的

一种基本情形。迟子建《群山之巅》对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采用，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取，正可以被理解为“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的形象注脚。更进一步，假若超越文学的范畴，联系现代社会理论，那么，迟子建《群山之巅》中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得这一文本事实，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现代民主权利的一种充分尊重。在这个意义上，细品“群山之巅”这一标题，则会有别种感悟生成。我们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迟子建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依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在写实层面上，“群山之巅”的所指自然应该落脚到“群山之巅的龙盏镇”上。因为故事的集中发生地正是龙盏镇，而龙盏镇一个突出的地理特征，也正是处于巍巍群山的簇拥环抱之中。但是，在象征的层面上，标题中的“群山”是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芸芸众生的一种隐喻式表达呢？联系小说文本中作家对于人物主体性的普遍尊重这一事实，这一结论的得出显然也并非突兀。

要想在一部篇幅大约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同时描写数十位人物，对迟子建来说，最大的考验恐怕在于怎样才能够保证赋予这一众人形象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就我个人一种真切的阅读感觉，《群山之巅》的一大思想艺术成功处，即在于虽然用笔不多，很多时候只是略做点染涂抹，但一众人形象却大多生动、丰满，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很多人物有着可以震撼人心的人性深度。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我们必须联系迟子建后记中“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这句话来加以理解。而这，也就意味着，“爱与痛”、“罪恶与赎罪”、“命运”、“灵魂”，正是我们进入并解读这些人物深邃人性世界的关键词。一旦我们依循着上述关键词进入《群山之巅》，就不难发现，迟子建在塑造刻画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意于一种精神分析深度的挖掘。

说到精神分析深度，《群山之巅》中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一位人物形象，是辛七杂。而辛七杂的精神分析深度，却又与其父辛开溜的坎坷命运遭际紧密相关。当年的抗战时期，辛开溜曾经是一位意志坚定的抗联战士。因为日本人执行“归屯并户”政策，抗联供给特别艰难。在一次追逐猎杀孢子的过程中，辛开溜不慎走失，远离了抗联部队。远离了抗联部队成为逃兵也还罢了，要命的是，抗战胜利后，辛开溜不仅偶遇日本女子秋山爱子，而且还在明明知道自己将会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情况下，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带着一个男孩子的日本女子。尽管秋山爱子不仅内心中一直牵挂着失踪已久的日本丈夫，并且在儿子不幸溺亡之后独自出走，但辛开溜却依然一往情深地依恋挂念着这个日本女人，而且还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明明是曾经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抗联战士，只因为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从此之后就踏上了万劫不复的被视为“民族败类”、可耻“逃兵”的悲剧



命运。尤其不能忽略的是，辛开溜的不幸遭际还影响了儿子辛七杂的命运以及儿子对自己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逃兵，这让辛七杂自幼受尽嘲笑，也让他对父母心生憎恶。”那个时候，为了外出寻找秋山爱子，辛开溜总是会把年幼的辛七杂托付给邻居看管。邻居们在讲关于辛开溜的坏话时，也从不避讳辛七杂，辛七杂对父亲的憎恶之情，便是由此而渐渐生成。辛七杂憎恶父亲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要找一个不会生养的女人做妻子，以免“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另一方面，辛开溜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辛七杂的意识深处，实际上一直潜藏着对父亲的亲情。这一点，在辛开溜病重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辛七杂面对父亲时的这种矛盾心态，能够让我们联想起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思的那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的相关描写与分析。“共青团员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被捕，她对此的看法具有相当代表性：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得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纸上读到相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对于依达·斯拉温娜的此种矛盾心态，论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样的情节读多了，读者忍不住困惑：难道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如果自己或亲友是冤枉的，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别人

也是冤枉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是一出现就立刻会被熄灭？一个有基本逻辑推演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还是人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推演，因为这样推演必然最终指向对制度的批判？似乎在这里，我们隐隐能触摸到恐惧导致虔诚的一个心理机制，那就是：恐惧导致选择性信息汲取与加工，而选择性失明导致虔诚。”尽管双方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但究其实质，辛七杂面对父亲被诬为“逃兵”问题时的矛盾心态，却与苏联社会的状况依循着同一种推演逻辑。归根到底，辛七杂的此种矛盾心态，应该说还是拜我们这个一直在制造着恐惧的特定社会机制所赐的结果。能够把对社会的批判如此不落痕迹地融汇到人物的精神分析式描写之中，所强烈凸显出的，正是作家迟子建艺术创造能力的突出。事实上，也只有充分理解了辛七杂的精神痛苦，方才能够理解他在父亲的骨灰中发现四片弹片之后的激动心情：“他攥着这把弹片，仿佛攥着父亲的灵魂，悲恸欲绝地说，‘爹，你不是逃兵！不是逃兵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辛七杂视为《群山之巅》中最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